

当代国际传播的三重困境与策略性突围

■ 周庆安

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开始参与国际传播活动之后,国际传播的机遇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媒介技术的变革,直接带来的是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这种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又引发了一个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我们该如何争取一个主动的国际传播话语权。

因此,国际传播话语权,再度成为新兴国家更为关注的一个命题。世界政治的趋势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发展、经济上的改革、社会的稳定之外,建设一个良好的外部国际舆论环境也成为了重要的保障。而今天,当我们讨论国际传播话语权这一命题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正视这个舆论环境的变化,对于我们分享国际传播话语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全球化对国际传播的影响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时,不少学者都引入了全球化的定义。一种趋势是将全球化作为国际传播的政治基础,并进而形成全球传播这一学术概念;另一种趋势是继续保留国际传播的研究范式,但是也同意全球化已经对国际传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体现在主权边界在新媒体面前的消减,媒介集团的垄断以及新媒体带来的传播主体身份模糊化等等。

这两种趋势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民族国家对国际传播的掌控能力越来越低,更主张通过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多种行为主体来实现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利益。因此,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各国都在重新调整自身的国际传播策略,并且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行为方式。其中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方式,开始引发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必须承认,公共外交是国际传播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产物,在公共外交的舞台上,除了政府之外,更多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开始成为传播者。但事实上全球化的影响并非如此单一。研究不断发现,国际传播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主流路径。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对信息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国家对传播内容的掌控能力仍然是最强的,只是信息传播的行为方式和渠道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在近期的中东北非变局中,美国国务院主要官员的信息,仍然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权威内容在Twitter等新媒体上进行传播。

因此,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的确是一种复杂的信息传播格局。各国的国际传播活动,都在形成一种国家、社会组织与个人相结合的传播形态。但是在这种格局中,多个主体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国家对于国际传播的强势地位。各国也都在寻找不同的方式,在国际传播中借助多种渠道体现国家的意志。

从“窃听门”看媒介的责任与自律

■ 孟威

“窃听门”所暴露的道德底线问题以及监管漏洞,不仅给新闻集团以及监管机构,也在世界传媒中引起震撼。“窃听门”已导致新闻集团陷入深度危机,即便默多克谙熟于应变之道,仍未能使集团摆脱尴尬处境。美业界预测,如果拿不出“给力”理由,默多克江山将辉煌不再。

常态新闻观损害媒介立业根基。媒介融入社会,需秉承一定的新闻价值观和道德观。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不同,西方新闻观强调独立性、人情味、冲突性、接近性、怪异性等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则要求我们注重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但不论东方西方,负责任的媒体,都要遵循真实、客观、公正、权责平衡、服务社会公益等原则。从道德层面看,媒介将其影响泛化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必然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媒介的道德指向,一个是指向外部和和谐,促进社会和人的精神发展;另一个是指向内部的约束,即培养健康追求的精神自觉。以此来衡量,“窃听门”恰恰暴露出西方媒介健康新闻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缺失。那种无视人格尊严,崇尚猎奇、



国际传播的三重挑战

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被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国家和主流媒体围绕国际传播,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硬件建设工作。这些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国际传播语境,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然而,当我们再次以一个强势的姿态进入国际传播活动中时,当代国际传播已经出现的三重困境成为了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对西方话语中心的国家来说,在主权概念遭遇新兴媒体冲击的过程中,跨国性的传媒集团率先取得了强大的话语权,并进而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形成了国际议程上的互动。这是我国在争取国际传播话语权方面面对的第一重困境。这种困境的形成背后,有国际传媒集团的强势地位,也有传统西方强国在话语权领域的重要影响力。这种国际传媒集团不但在内容上产生了较强的“意见同化”,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购活动,如爆出窃听门丑闻的《世界新闻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近期的并购活动就频繁进行,在英国已经掌握了35%的报纸。而这些跨国性的传媒集团在西方话语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国的报道仍然存在一定误读,对我国形象的正常传播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的国际传播活动,势必面对这个话语权的传统优越感。

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来说,我国的国际传播同样面临挑战。因为这些国家其中有一部分仍然维系了比较严格的传播政策和管理秩序,对其本国新闻体系或者对外传播活动的公开程度极其有限。这些国家中还有不少处于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政治环境中;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或在较长一段时间中持续一种相对简单的传播模仿行为,大量转载西方媒体报道,或者受到国际主流

媒体的议程设置。例如在2009年7月的一次访谈中,一位智利学者就明确谈到,智利国内的涉华报道中除当地华人的新闻外,最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以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为代表的西方国际通讯社。我国媒体要进入这些国家,并成为它们新闻的最重要传播者之一,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这也是我国的国际传播要跨越的障碍。

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际传播,前所未有地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国内舆论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也从未像现在这么大。由于信息流动的门槛越来越低,我国国内近期矛盾多发的态势,也使更多的国内新闻影响我国的国际传播,进而对我国国家形象产生影响,并容易出现“对外传播和国内新闻两张皮”的状态。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远的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近的如2010年至今的不少群体性事件中,国内舆论都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1997年开始到今天的14年时间里,海外媒体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国内社会问题数量开始出现明显上升,从2010年开始,在十家主要的海外媒体的涉华报道中互联网的信息来源第一次超过了10%。甚至在近期的《外交政策》杂志上,美国媒体公开认为中国的微博已经在打造一个“谣言共和国”。这种国内舆论对国际传播的明显影响,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巨大挑战。

二是多元媒体手段与传统新闻内容的结合。尽管我国的传统媒体历史不如西方媒体时间长,但是追赶速度惊人,而且从新媒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站在了几乎相同的起跑线上。但是我国的国际传播建设,仍然集中在新兴媒体的设备建设上,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整合体系。今天的国际传播增长点,不取决于技术的进展,而取决于这些技术能否较长时间持续推动对新闻的关注。例如2006年视频网站萨达姆被施以绞刑视频,就驳斥了官方塑造的萨达姆“平和终结”的舆论氛围。其实这些都说明,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国际传播并不难,但难在什么时候借助新媒体手段。

国际传播突围的必经之路

根本上看,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突破前述三种困境。从硬件技术上看,随着国家投资的增大和各媒体自身建设的强化,硬件技术的突破已经成为了可以预见的前景。

但是更重要的实际上在于国际传播的软件建设。这种软件建设体现

在人才、报道方法、报道范围和时效性等等多种因素的提升,但是鉴于国际传播的主体是中国,国家主流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软件建设上两方面的结合刻不容缓。

一是历史文化形象与突发事件报道的结合。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长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播,突发事件报道一直多有不足,但是这些年来国际传播中的新闻内容,越来越趋向于现场化、细节化,甚至因为新媒体的介入而出现碎片化的趋势。我们的国际传播,一方面要更重视国外分社的快速反应能力,重视国际新闻的对内和对外传播;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国国内新闻第一时间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由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国际传播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这个时候我国的媒体对外传播有明显的地缘和信源优势。

二是多元媒体手段与传统新闻内容的结合。尽管我国的传统媒体历史不如西方媒体时间长,但是追赶速度惊人,而且从新媒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站在了几乎相同的起跑线上。但是我国的国际传播建设,仍然集中在新兴媒体的设备建设上,而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整合体系。今天的国际传播增长点,不取决于技术的进展,而取决于这些技术能否较长时间持续推动对新闻的关注。例如2006年视频网站萨达姆被施以绞刑视频,就驳斥了官方塑造的萨达姆“平和终结”的舆论氛围。其实这些都说明,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国际传播并不难,但难在什么时候借助新媒体手段。

总之,完成国际传播的能力提升,对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面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关键环节在于,充分认识国际传播环境中的全球因素和新媒体因素,并从传播结构下手,不断探索国际传播的新方法。

(摘自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国际变局中的媒体新角色

■ 高祖贵

进入2011年以来,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迎来新的形势。在这种新形势的不断变化中,舆论和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在全面客观报道的前提下凸显自身的公信力与新角色,成为当今媒体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舆论与媒体扮演新角色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上的“后危机时代”来而未到,美欧多国继续努力促进经济复苏,但依然面临多重困难;全球通胀形势更趋严重,油价、金价和粮价高位徘徊,世界经济走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政治方面,多国社会矛盾加剧,美、法、俄等大国选战提前开锣预热,其内外政策走向备受关注。在国际战略格局方面,美国从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推行新的网络安全战略等多个方面着手,力图确保和稳固其全球领导地位;欧盟继续遭受希腊等国债务危机拖累,经受利比亚战争的考验;日本在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又受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组成的综合危机打击,政局更趋不稳定,国家总体呈现下沉态势;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大国之间的竞争合作更趋突出。在国际安全方面,传统安全问题在利比亚战争、美俄开发和部署新型导弹及导弹防御系统等因素的带动下依旧突出,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增大。从地区范围看,尤其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中东变局的发酵和南海形势的发展。

中东大变局从突尼斯和埃及开始,迅速横扫北非和西亚,荡涤也门、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摩洛哥、阿曼、科威特、沙特和伊朗等21个国家,波及近5亿人,大有导致多国政局变动并向更广泛地区扩散之势。这一轮变局中,土耳其、伊朗、沙特、阿盟、非盟等地区性力量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而且程度不同地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脱美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以色列在地区范围内面临的安全形势恶化,在巴以和谈、黎以关系以及伊朗核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放弃谋求连任,巴内部分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着手组建联合政府,并积极寻求联合国大会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巴以和谈由此面临新的形势,黎以再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南海地区事态的发展同样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后,美国防部长盖茨就加强美国在南海及亚太地区力量存在发表讲话;同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支持美军在南海捍卫所谓美国权益的议案。与此紧密关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为捍卫它们各自所宣称的在南海的利益采取种种动作,特别是美菲和美越相继围绕南海展开外交联动和军事演习,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南海形势的关注度,甚至被描绘成似乎快要爆发武装冲突的海域。所有这些事态的演进,呈现出中国、美国、中国的亚洲邻国三方之间互动的大格局。其中,中美之间的军事和外交互动成为主线,包括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防务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会晤,以及首次亚太事务磋商。这表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展开,博弈及其结果将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形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深入发展和诸多风险上升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和处理各种变局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就这个意义而言,媒体能否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呈现事态,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有助于准确看待和处理各种变局的舆论环境;舆论是否被误导和是否保持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变局是否被误判以及有关应对的决策是否得当。这一切将影响各国能否正确处理争端和竞争,能否加强磋商与合作,能否增进全球治理,最终将影响各国和世界的发展与安全。例如,各国媒体对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报道是否客观全面,直接影响各国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信心,导致股市、汇市、房市、金市的震荡;各国媒体对恐怖袭击、食品安全和自然灾害的报道是否适度,直接影响人们对当今世界的安全感;各国媒体对中东变局和南海形势的报道是否客观全面,更是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选择和有关问题的解决。

国际形势客观报道凸显公信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局中,能够比较全面客观报道的媒体,就能由此获得较高的信誉,话语权就会随之提升。反之亦然。美国CNN报道利比亚局势时被指“在酒店里编新闻”,自然在与FOX的竞争失去了优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站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当局的对立面报道中东变局,使其信誉受到质疑。

相较而言,中国媒体在上述国际形势的报道中进步突出。例如,在报道利比亚战乱时,既反映利比亚政府控制的黎波里等地的形势,也反映反对派控制的班加西等地的形势,力求全面客观。在报道南海形势和中美关系时,既反映有关国家挑起争端的举动,也及时反映有关国家为缓和局势而做出的努力;既反映中美关系在这些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中美两国在这些议题上的交汇点和为防止局势恶化做出的努力,力求促使舆论保持比较理性的状态。

然而,在看到这些进步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日益拓宽加深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媒体要在国际舆论中进一步提升话语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报道国际事态时,中国的媒体理应更加注重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例如,西方舆论和媒体关注和报道中东变局充分体现其价值观标准,所使用的词语是“民主”、“自由”、“独裁”、“威权统治”、“公民社会”、“网络自由”、“伊斯兰极端主义”等。从中国的角度来独立地进行观察和评述,把穆巴拉克说成“独裁者”、把穆斯林兄弟会说成“伊斯兰极端组织”、认为家族执政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表现,诸如此类的表述,都显得不够客观和准确。西方舆论在报道南海形势时,多数认为是中国在采取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把中国视为南海航行自由的威胁。中国媒体当然要对此予以明确批驳,但同时要注重摆事实 and 讲道理,以客观性增加说服力。

此外,我们已经在中东变局中见证了以“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媒体在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行动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它们与美国CNN、英国BBC、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紧密互动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影响力。同样在有关南海形势的舆论中我们也看到了我国民众通过网络表达的意见的影响。中国媒体应该更加注重发挥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优势,特别是它们与传播媒体联系互动形成的强大塑造力和引导力,从新的高度深入看待和积极发挥新媒体的角色和作用。

摘自《对外传播》